

EIEVI文化和社会行为

- 约瑟夫亨利克

来自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表明，人类社会行为在很多领域都有很大差异，包括合作，公平，信任，惩罚，侵略性，道德和竞争力。解释这种全球变化的努力越来越多地指出了一揽子社会规范或制度的重要性。这项工作表明，与匿名市场，道德化宗教，一夫一妻制婚姻和复杂的亲属制度相关的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的心理和行为。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关于文化进化和基因协同进化的工作提供了开发理论的工具和方法，以解释这些心理和行为模式，并理解它们与文化和人性的关系。

地址

-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心理学系
-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加拿大

通讯作者：Henrich, Joseph (henrich@psych.ubc.ca)

目前的行为科学观点, 2015年3: 84-89

这篇评论来自一个关于社会行为的主题问题]神经科学

Molly Crockett和Amy Cuddy编辑

<http://dx.doi.org/10.1016/j.cobeha.2015.02.001> 2352-1546 /©2015

Elsevier Ltd.保留所有权利。

介绍

社会行为在人口和整个历史中都有很大差异。这适用于心理学研究人员通常考虑的许多领域，包括合作[1,2,3°]，信任[4,5]，公平[6,7]，群体偏袒/欺骗[8,9]，昂贵的惩罚[10]，侵略性[11]，道德[12]和竞争力[13]。让我们从三个例子开始。

合作与惩罚

为了研究合作和惩罚，赫尔曼和他的同事[3°]在全球16个不同人群的大学生中进行了重复的公共产品游戏（见图1），从波士顿和墨尔本到首尔和明斯克。在标准的重复游戏中第一轮的平均贡献（一种合作程度）在哥本哈根（几乎是最大值的80%）与马斯喀特相比（约为40%）几乎是其两倍，在一些人群中，贡献随着人们的参与而下降。在其他人中，他们没有。然后，当参与者支付惩罚其他玩家的机会被添加到基本游戏设置中时，各组之间的多样性增加甚至更多。第一轮的贡献现在大约为30伊斯坦布尔，利雅得和雅典的比例在波士顿，哥本哈根和圣加仑（瑞士）接近80%。最引人注目的是，与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和民主（WEIRD）的通常实验不同。选择权[14]，惩罚的机会导致非合作者的制裁和高合作率的增加，惩罚机会的增加使得一些地方的情况变得更糟。在这些地方，参与者不仅惩罚了低贡献者，而且还惩罚了高贡献者，这使得总体贡献的任何增加都受到了影响。这种“反社会惩罚”并不是一些实验性的怪，并且很可能捕捉到人类心理变异的真实和重要性，因为它与这些人群的“公民合作规范”和“法治”的衡量标准强烈负相关。这意味着即使是强有力的合作治疗效果，如增加同伴惩罚，也不能轻易地从WEIRD样本中推广[15]。

公平与惩罚

我和我的同事首先在全球15个不同的社会[16,17]中部署了最后通游戏（图1），包括狩猎采集者，园艺师和牧民；然后，几年后，我们使用三种不同的讨价还价实验在第二个项目中复制并扩展了这些发现。总的来说，我们研究了24个不同人群中的多个社区，并从第一阶段复制了我们更不寻常的发现。某些人群的优惠从20%到50%不等。在最后通Game博弈中，来自洛杉矶或密苏里州小城镇的非学生美国人提供了大约48%的大赌注。在惩罚者方面，美国人经常拒绝提供低的最后通Game游戏，即使是纯粹自私的提议者也必须提供50%。与此同时，在一些人群中，没有人拒绝任何积极的提议，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切。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报价接近100%，近一半的人口拒绝提供greco / 1 / M fi zz / f。不是由混乱或误解引起的，这种现象在WEIRD人群中几乎不为人知，但在其他地方似乎相当普遍，包括中国和俄罗斯[18,19]。随后在六个不同人群中进

行的发育研究表明，在7岁时开始出现这种实验中平等的昂贵偏好，在青春期中期产生了显着的群体差异[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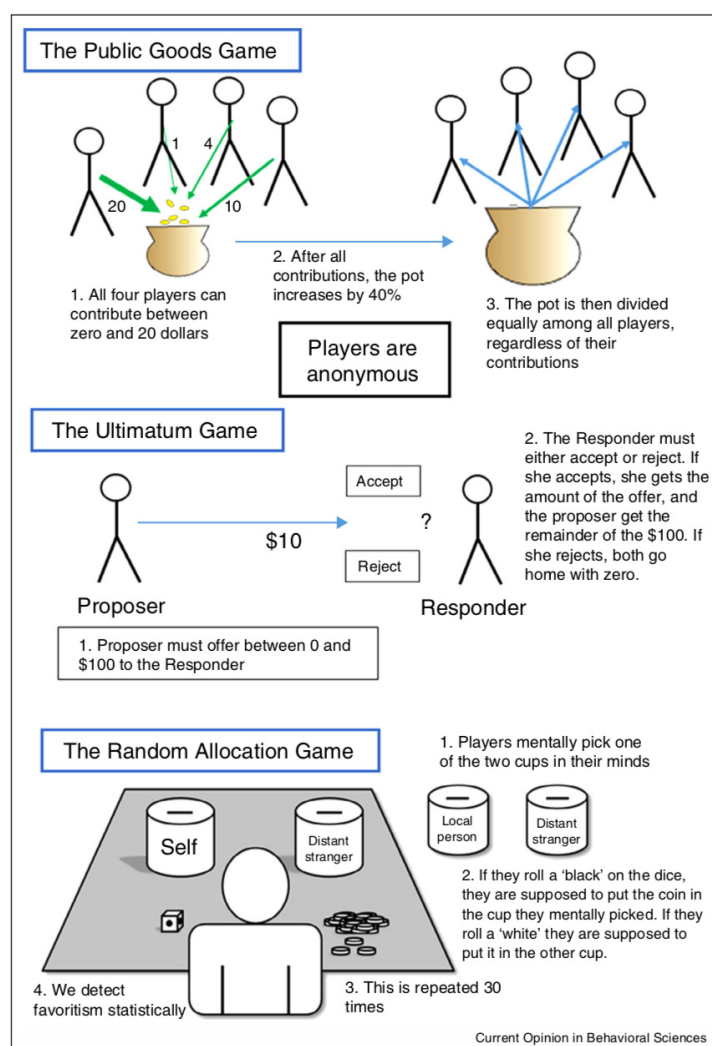


图1.文中描述的三个主要经济实验。

群体偏袒/狭隘主义

Hruschka和他的同事[9“]开发了一个名为随机分配游戏的新颖实验（图1），允许参与者匿名作弊，使自己或当地社区偏向偏远的陌生人。他们在玻利维亚，孟加拉国进行实验，斐济，亚利桑那州，冰岛和中国发现了巨大的变化，美国人和冰岛人对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地方团体没有偏袒远方同胞。这些发现与传统的非激励性的群体偏好调查措施一致。基于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数据[8]，或者像集体主义，裙带关系和同胞主义这样的狭隘主义。

对于许多实验研究人员而言，这些研究结果令人生畏，因为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理论上或制度上都没有很好的能力来处理人口层面的心理和神经学差异。例如，许多心理学家倾向于认为跨文化研究是一种麻烦[22]，只是为了证实他们的发现的普遍性（通常基于WEIRD本科生[23,24]）。相反，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观察到的巨大的心理和行为变异应被视为一种智力机会，激发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方法[25]。世界充满了尚未开发的心理变异和自然实验，可以用来开发和更好地测试理论，理论开始映射心理学，制度，生物学，生态学和文化进化之间的联系。让我们考虑一系列与心理差异相关的社会规范 - 制度（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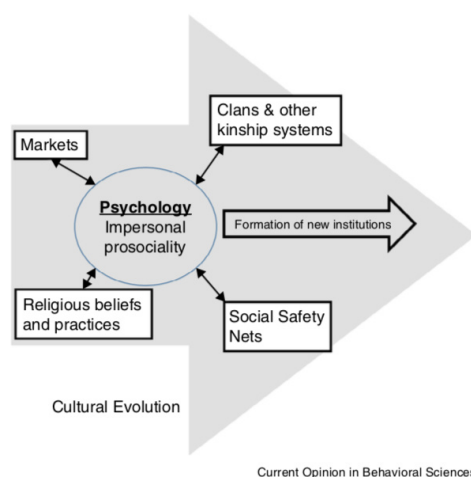


图2 - 心理学，制度和文化之间的界面。

机构与心理学

市场

市场制度是一套社会规范，规范陌生人之间的交流，或者至少在那些没有家庭，友谊和社区关系的人之间进行交流。 在我们对非个人亲社会性研究（如上所述）中借鉴文化进化理论，我和我的同事认为，市场制度将在文化上与社会规范共同发展，包括内化动机，非个人信任，公平与合作。 我们发现并复制了我们的市场整合措施与三种旨在衡量非人格公平的经济博弈中的平均报价之间的巨大相关性。 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Rustagi及其合作者[26,27]通过利用埃塞俄比亚高地的自然实验，建立了从市场到动机的一种因果路径。 在那里，因为人们在地理位置上依靠世袭的土地使用权，所以社区与市场的距离可以用作市场整合的外生代理，并用于推断因果关系。 这项工作揭示了市场接近与合作行为之间的紧密关系（参见参考文献[28]）。 在实验室中，一系列证据表明启动

市场增加了非个人信任[29]。总之，这些研究表明，市场制度与社会性的心理差异有着共同的作用。

宗教和仪式

Norenzayan及其同事[30, 31, 32]认为特定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实践在文化上传播，因为它们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增加了社区在与其他群体竞争中的成功。例如，相信监督和惩罚违反亲社会规范的强大的道德化神可能会使人们更有可能遵守这些规范。根据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这些伟大的道德化神灵的世界宗教信徒，与那些坚持传统宗教的人相比，讨价还价游戏提供了6-10% [7]。与此相关的是，现在几十个启动实验证明，无意识地提醒宗教人士（但不是无神论者）的“上帝”会使他们在经济游戏中表现得更加平庸[30, 33]。同样，最近的作品展示了各种仪式元素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交性，包括同步，音乐制作，昂贵的行为，以及许多通过仪式所创造的可怕体验[34, 35-43]。在宏观层面，特定宗教信仰和做法的心理影响可能会加速经济增长，提高生育率和减少犯罪[44-47]。总的来说，这项工作表明，宗教信仰和仪式也是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文化共同体。

生态和氏族

Talhelm及其同事[48]假设某些生态条件，特别是那些有利于密集水稻种植的生态条件，应该有利于形成高度合作的群体。在中国的情况下，这种生态压力可能会产生紧密编织的父系氏族。为了测试这一点，该团队在中国各地的大学中以两种方式测量了群体偏好，然后挖掘了中国各省水稻种植的自然变化。结果显示水稻种植和群体偏爱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作者通过使用外源性水稻适宜性测量（土壤对水稻的生态效益）预测实际水稻生长，然后使用这些估计来预测他们的心理测量，向显示因果关系迈出了一步。这消除了集体主义心理学可能导致更多水稻生长的担忧，以及对第三个变量可能导致集体主义和水稻种植的担忧。这些发现提供了一种文化进化理论，将生态学，社会结构和心理学联系起来，

并且可能有助于解释创新中的跨国差异[49]。

一夫一妻的婚姻

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是一夫多妻制，允许高地位的男人与多个妻子结婚（同时）。一般来说，社会越富裕，一夫多妻的婚姻程度就越大。然而，中世纪和后来的欧洲社会在规范性一夫一妻制方面相当不寻常，这个机构最近才在全球蔓延，1880年到达日本，1953年到达中国，1963年到达尼泊尔。在非洲大部分地区，部分地区继续保持多义婚姻。中东地区。现在，趋同的证据表明，这种“特殊制度”，正如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50]，通过抑制男性与男性的竞争，戏剧性地影响男性心理学和潜在的男性荷尔蒙。在一夫多妻制社会中，随着地位较高的男性与额外的年轻妻子结婚，竞争和婚姻市场的竞争大幅增加。为了进入“游戏”，需要戏剧性地提高自己的地位，低地位的男性变得容易冒险并且对未来大幅折扣，导致犯罪率和药物滥用的增加。与此同时，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结婚和生孩子可以驯服男性，降低睾丸激素并产生心理反应，通常包括大量的儿童投资。总体而言，通过心理效应的组合，规范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可以减少犯罪，竞争，家庭暴力，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以及配偶杀人案[51]。

社会安全网和安全

Hruschka和他的合作者使用实验和调查措施揭示了群体偏好与物质安全之间的正相关性，使用参与者自己的主观测量和国家层面的机构测量[8,9]。团队测量了物质安全性单独使用一个评估人们对短期和长期食物充足的焦虑的量表。利用塞拉利昂和格鲁吉亚共和国准实验情况的平行工作表明，战争经验创造了群体的持久增长偏袒，但只有当经验发生在大约7到20岁的发育窗口时[21]，也见[52]。

这些研究表明，与婚姻，市场，宗教，亲属关系和安全网相关的机构对人类心理和社会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它还表明，来自市场一体化，非亲属社会与道德神和规范的一夫一妻婚姻的人将会有一种相当奇怪的社会心理。但是，我们如何理论化机构？机构来自哪里？

目前，心理学和经济学在理论上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释制度的起源[53]。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建立一个能够解释制度来源的文化进化理论，研究人员回归基础，重建我们对人类进化和物种本质的理解[54,55,56°，57]。这些方法，而不是忽视我们的物种对文化的极度依赖，使用自然选择和数学建模的逻辑来询问自然选择如何塑造我们的学习心理，以最有效地从他人的思想中提取思想，信念，动机和实践。。这种思想行动消除了“进化”和“文化”解释之间的破坏性二分法，并在扩展的达尔文主义伞下完全融入了文化解释。假设的文化学习机制可以并且已经在实验室和现场，来自不同社会的婴儿，儿童和成人中进行了实验测试[54,58-63]。

然后，这个基础允许理论家通过建立经验建立的心理机制来模拟文化进化。结果是文化进化博弈[64]。这个强大的工具已被用于了解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出现，包括与社会分层[65]，种族群体[66]，荣誉文化[67]，信号系统[68]相关的规范和制度，惩罚[69-71]和各种声誉系统[72,73]。当然，这个研究计划真的刚刚开始。

最后，许多研究人员希望研究那些使我们成为独特人类的心理过程。问题是，在这一点上，对不同人群进行的系统比较实验研究很少，我们目前缺乏可靠的方法来了解我们何时开始固有的心理过程，或者是几个世纪文化进化的产物，它们构建了独特的制度形式，例如与宗教，仪式，家庭，市场和婚姻有关的形式。前进的方向是将全球作为一个实验室，并设计研究计划，利用它提供的巨大机会。

利益冲突声明

没有宣布。

致谢

感谢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委员会（SSHRC）和加拿大高级研究院（CIFAR）。还要感谢Cristina Moya和Colin Xu。